

大家国学

『大家国学』者，前辈大师的国学修为，今日大众的国学养分也。
在「国学热」经由电视讲坛途径进入百姓视野、传统文化过度娱乐化而国学常识却明显匮乏的当下，听听昨天的大师们怎么说，是一种补课，更是一种参照。

王国维

卷

《国学丛刊》序
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人间词话》
《流沙坠简》序
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 著
于闽梅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王国维 著 于闾梅 编

大家国学

王國維

卷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家国学·王国维 / 王国维著; 于闽梅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3

ISBN 978 - 7 - 201 - 06151 - 1

I. 大… II. ①王… ②于… III. 国学—中国—文集
IV. Z12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0814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丛书题字 王元化

丛书策划 益琳福 成 之

大家国学·王国维

作 者 王国维

编 者 于闽梅

丛书编辑 曾 羽

责任编辑 马晓雪

特约编辑 吴春艳

美术编辑 兰 馨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hs.com.cn>

邮 箱 tjrmchs@126.com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2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1 - 06151 - 1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大家国学》这套丛书，是在“国学热”持续升温的氛围中间世的。承编者要我写几句话，考虑了一下，想有这样几点可说。

第一，我要讲的是，“国学”并不是“一阵风”式暂时流行的话题。

“国学”和“国学热”，现在已经成为媒体习见的热门名词。上海的《学术月刊》与《文汇读书周报》，曾将国学评选为“2005 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2006》，在历史学部分专设“国学热的挑战”一节，描述国学怎样“得到学者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引发了如何重新评价传统学术文化和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及作用，当代中国是否需要‘重振国学’、‘重振国学’是要‘接续文脉’还是‘复辟返古’等问题的争论”。刚刚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2007》，又设有“国学热的反响”一节，于叙说“国学热仍在持续，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之余，着重介绍了一些论作对这一潮流的批评讨论。不难预料，明年的《发展报告》还会把国学列为重点内容。

国学之所以热，决不是出于偶然，也非少数人炒作能致，应该说，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一种体现。中国的振兴，正在国内外造成强烈的震撼。身历祖国由积弱转趋盛强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反躬省察自

己的文化传统，希望以其精华贡献于世界。外国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也一定会更加关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求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而这又增加了中国人探讨研究传统文化即国学的责任。这样看来，国学之热当前仅仅是开始，其高潮尚远在后面。

第二，我想说，“国学”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范畴。

现在有了成熟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学科，为什么还要谈什么“国学”？这样的问题，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过了。前些时，我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光明日报》国学版合编的《年度国学 2006》写了一篇题为《国学的存立》的小文，涉及这个问题。

我在那篇短文里提到，一九一一年初，王国维先生给《国学丛刊》撰序，主张“学无中西”，他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钱穆先生在江南授课，其讲义《国学概论》弁言也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需要指出王国维讲“学无中西”，其“学”是“专以知言”，即具体的知识，不能说中西的文化学术彼此一样，钱穆的“学术本无国界”，也应作如是观。

不仅文史，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样。二〇〇五年，我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上说过：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本身确无所谓中西，但作为科学产生和发展背景的社会、文化是无法摆脱地域或民族色彩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科学的形成、发展有着不一样的途径和过程，在社会、文化中科学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中国的学术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独特之处，从而“国学”终不可废。

第三，我还想建议，大家通过学术史的角度来认识国学。

“国学”一词，本由与“西学”区别而出现，通行既久，其涵义似乎人人明白。然而如果像北京话说的“较起真来”，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内涵、外延如何，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争论。今天要求一下子讲清楚，实际是做不到的事。

经常有朋友、同学问我，要了解国学，初识门径，应该从哪些书入手，我总是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一本便是上面提到过的钱穆《国学概论》。章书从小学谈到经、史、子、集，是横的分类介绍，钱书自孔子下及民国，是纵的历史叙述。两书体例不同，但和其他类似著作一样，贯穿着作者本人的见解。如欲比较全面地知道国学的范围与内容，特别是学者各家的异同，还必须博览种种重要论著，即所谓原典。

当然，国学历代论著浩如烟海，绝非有限时间所能涉猎，这便需要选择与我们最关紧要的优先阅读。前辈学者为我们树有典范，重视学术史的研究，尤其是上一世代学术史的研究。例如梁启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引导促进当时学术进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民国前期的学术文化是直接由清代延续变革而来。我们距离清朝已远，要接触学术文化传统，自然首先是二十世纪的国学诸家。认识国学，最好先来阅读二十世纪诸家的作品。

《大家国学》丛书，正是为此设计的。编者就二十世纪名家学者，“选择其关于国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学术等概论性、常识性的文字成一选本”，“以便于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把握学者最基本的国学修养与学术思想”，这确是便利一般读者的创意。相信这套书会继续编印下去，对国学的普及和中国优秀文化的阐扬，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学勤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一日

前 言

王国维先生(1877—1927),初名德桢,后改为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后更为观堂,又号永观。1877年12月3日生于浙江海宁县城内双仁巷,其家“故中人产也”。年十六时,以自小存储的压岁钱购“前四史”,自谓此是“平生读书之始”。1893年,十七岁的王国维最后一次勉强参加科举考试,“不终场而归”,其矛盾性格已初步流露。1894年至1895年,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为中日甲午海战群情激愤时,王国维“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他开始读康有为、梁启超的“疏论”。1898年2月,王国维离开家乡海宁,供职于上海最新潮的《时务报》,入东文学社学习日文。1901年赴日本留学,旋因病归,先后任通州、苏州师范学堂教习,并编译《农学报》与《教育世界》杂志。1906年赴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并潜心研究哲学和词曲。辛亥革命后到日本,专事甲骨文、金文、汉简和古器物的研究。1916年回国(上海),继续致力于殷周汉魏金石文及古史的研究,后又兼及敦煌文献、西北史地及唐宋尺度的研究。1923年,任清废帝溥仪“南书房行走”(文学侍从)。1925年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6月2日(五月初三),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卒后被溥仪谥号为“忠愍”。

王国维自叙十六岁起就开始超出应试教育的狭窄读书范围,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开始,他接受史书和考据的训练而轻视科举时文。他的学生吴其昌说:

先生非经学家也。……先生于《易》、《诗》、《书》、《礼》、《乐》、《春秋》，皆并未尝有一部专著。其可纯粹止为经学著作者，仅《尔雅草木鸟兽虫鱼释例》一卷。……与其目之为经学……毋宁目之为史学，为上古事物名称及方言语音之源流变迁史也。^①

王国维早年唯一留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也与历史有关。《咏史》约成稿于1897年，以古代政治人物（帝王将相）为主干，诗学观点仍以儒家人伦教化为依托，重社会功利以及国家种族的兴亡。《学衡》主编吴宓称：《咏史》“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1928年11月，《学衡》第66期）。从文学角度看，《咏史》“以议论为诗”的成分很大，说明王国维此时对境界的认识还未达到自觉阶段。《咏史》引起罗振玉的重视。^②从史学角度看，我们从诗中不难看出，王国维在一种过渡时代思潮冲击下，产生了一种对“新学”的向往。^③

王国维处在一个激变的时代，先是十八岁时正逢中日甲午之战，十二岁戊戌政变、二十四岁时庚子事变、三十五岁时辛亥革命，然后是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北洋军阀混战，国共之争。在他自沉前，正值北伐军即将攻入北京，所以叶嘉莹先生说：“静安先生个人的悲剧之演出，其背景便恰好是这半个世纪的多灾多变的中国的苦难。”^④如果把王国维形容西周崩溃后的文化情状之语用于晚清，则可以很好地形容他所处时代的历史语境：

① 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学述》，《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第183—184页。

② 1898年2月，王国维进入上海《时务报》。6月，罗振玉在东文学社学生扇面上发现并激赏王国维的《咏史》中的诗句“千岁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大异之”。

③ 严复《天演论》最初刻本于1895年4月出，而王国维《咏史》中有“惨惨生存起竞争”之句。

④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16页。

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化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
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论近年之学术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堂先生学术兴趣的转移也与历史时代关系密切,终其一生,他在学术上曾有四次“弃”和转向。第一次是发生在1894年至1895年,他放弃“旧学”,以读康有为、梁启超的“疏论”为主,在思想上有一次反传统经学的转变。第二次是1898年2月他离开家乡海宁到上海《时务报》供职后,通过学习日文真正开始致力于“新学”,从而“弃”了原先感兴趣的康、梁之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王国维于三十一岁时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文集《静庵文集》,中心内容是哲学和文学评论。他在《三十自序一》中叙述他研究哲学的经历,并表示: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从这些苦闷彷徨的话语中,可见他在学术上作根本转变的征兆。第三次是1908年到1912年中的另一次“弃”,王国维的研究由哲学转向文学,尤其是传统词曲。这一次转向是观堂先生把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论相结合,创造性地阐释中国文化的一种尝试,其标志是《人间词话》和1913年完稿的《宋元戏曲史》。连日本学界都注意到他的研究,如盐谷温氏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五章中承认,“王氏游寓京都时,我学界也大受刺戟”。但王国维在书中的解释却很谦虚:“世之为

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1908年发表的《人间词话》,以“境界说”融合中西美学。本书选取了他在《国粹学报》中最初发表的影响最大的六十四则(1908年10月—1909年1月)。这六十四则经过王国维数次删改,对于研究王国维美学和文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价值。

随后的第四次“弃”是决定性的,1912年,在罗振玉的劝说下,王国维彻底弃西学,完成了一次“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式的转变。1913年,他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等。1916年2月17日,王国维在日记中对日本京都的四年多生活作了一个总结:“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唯学问变化滋甚。”他由重读“儿时所不喜的”的《十三经注疏》开始,彻底回到了传统。这四次“弃”,用李长之一语中的的话说,就是“他治学的变迁,显然是支配于时代和他的性格”^①。罗振玉为《观堂集林》作序时,专门叙述了王国维学术趋向变化的过程——

余交君二十有六年,于君之学问之变化知之最深。光绪戊戌(1898),始与君相见于上海……君方治东西文字,继又治泰西哲学。逮岁西未(1907),君有《静庵文集》之刻。戊申(1908)以后,君又治元明以来通俗文学,时则有《曲录》之刻,而《宋元戏曲史》亦属草于此。……辛亥之变,君复与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始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

不过,罗振玉所述的王国维的学术转型,其实是王国维本人自己所作的总结。据1923年6月王国维给蒋汝藻的信,这篇罗序其实是王氏代撰,罗振玉不过在此基础上“改定数语”。

书稿初成于1921年,随后不断增补,最后加上1923年的新作,共

^① 李长之:《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文学季刊》创刊号,北平立达书局,1934年,第238页。

二十四卷,有罗振玉、蒋汝藻的两篇序,包括《艺林》十四卷,《史林》十卷,《缀林》(诗词作品)两卷。王国维的学生赵万里说:“先生之辑《集林》也,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少作之无关宏旨者,悉淘去不存。旧作如《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尔雅草木虫鱼兽释例》,亦只存一部分而已。”该书出版后,王国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当时授课的讲义《古史新证》,主要就是从《集林》里摘录的。《观堂集林》涉及的国学领域十分宽广,正如蒋汝藻在序中所言,“窃谓君书才厚数寸,有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这是最中肯的评价。《集林》中文章,有的只是一条札记,然而内涵丰富精深,比起一些人的空言无物的长篇巨制来,更可见王国维的“深湛之思,创造之力”。《艺林》系遵《汉书·艺文志》所设《六艺略》,指经学,包括《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尔雅》以及小学(文字、音韵)。《史林》首列殷周史,继之以地理、西北民族史志,然后有简牍文书、金石、敦煌卷、版本目录等研究。

《观堂集林》作为第四次转型(或者称为“定型”)后的产物,其实是王国维一生的最后研究成果总集。用罗振玉序中的话(即王国维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日本汉学两大流派中的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狩野直喜,与王国维在京都四五年间多有往来,在他看来,“从来京都开始,王君在学问上的倾向,似有所改变。这是说,王君似乎想更新中国经学的研究,有志于创立新见解。例如在谈话中,我提到西洋哲学,王君总是苦笑着说,他不懂西洋哲学,其后从元代杂剧的研究扩大,成《宋元戏曲史》,此书对王君可说是业余的著述。正如其常谓,杂剧的研究以《宋元戏曲史》为终结,以后不再研究了。当时王君学问研究的领域,已转了一个方向,当时王君似在精读《十三经注疏》,前四史也正精读之列。寓居京都闲暇日多,自然耽于精读,为读书而翻破书,是件有

意义的事。除非有很多闲暇,不然那是不可能的”(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

但是,要认清王国维学术的全貌,并不能只读《观堂集林》。虽然他自己对他前半生的工作已予别弃,但这些工作却并非只是“无关宏旨”。王国维死后不久,由罗振玉及王氏从弟国华、学生赵万里编辑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共有书四十三种,一百零四卷。1934年,陈寅恪为《遗书》撰序,就指出王国维无论是在治学方法还是在研究对象上,都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概括王氏的学术成就为三个方面:第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獯鬻考》等是也”;第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儿坚考》等是也”;第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有人认为王国维专心著述,对政治不感兴趣。虽然王国维基本上不公开发表政论,但是,不公开发表意见,并不能说明王国维不关心政治。我们只要看一看他与朋友的来往书信,就会发现他对政治和时局的关切:

胶事了后,英俄起而争借款之事一再,几至决裂。现闻政府拟兼借两国之债,或可稍纾目前之祸,总之,如圈牢羊豕,任其随时宰割而已。(1898年2月27日)

闻法人又据马江,直索船政局,德人又据马祖澳(亨利乃不至胶州而至福州),不知确否?瓜分之局已见榜样,如何如何!(1898年5月)

外患日逼,民生日困,虽有智者,亦无以善其后。(1898年6月8日)

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1898年9月26日)(以上书信均见王国维致许同兰书信)

可见1898年王国维的思想倾向于变法一边,所以才会对海宁士人责怪变法派发出“欲不死得乎”的激烈意见。1899年以后,王国维到东京留学,后回国入学部,一直到1912年出国前,没有书札留存。但我们跳过中间空隙的十年,就会发现:虽然1912年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对于时局的关切依然;虽然政治立场明显由支持维新转而保皇(他自称“亡国之民”),但反而由此更关心时局,为变革后的社会之混乱叹息不已。1912年他创作《颐和园词》,据他自述,“此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并由小及大,“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他甚至由此推及他国的政治,“于贵国社会政治前途颇有隐患”。(以上引文均见致日本铃木虎雄信,1912年11月15日)可见,即使于1897年至1912年间,王国维也并没有超脱于他的时代,他受时代的影响,对时局极为关切、焦虑万分。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王国维和严复等知识精英宣布返回传统。严复回到福建家乡的村子退隐,王国维则退隐于日本。1912年,在完成《宋元戏曲考》后,王彻底放弃了文学研究,转向史学和训诂、考古,正如严复所自谓的,“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以此却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精神死亡而肉体尚在,映射了灵魂的深度苦痛。“欲语此怀谁与共,鼙声四起斗离离”,王国维的文字充满了幻灭悲观的情绪,他对时局从来没有流露出乐观的论调,

这使他最终逃避到时代之外：

闻道南山薇蕨美，膏车径去莫迟疑。（《病中即事（甲辰）》）

人间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终古众生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嚣。（《平生》）

1916年，王国维似乎对启蒙完全丧失信心了：

天下滔滔，献词沦胥之祸遂始于此。可知中国总是此中国，人民终是此人民，虽有圣者亦无可为计。（致罗振玉，1916年3月30、31日）

以后便拟简出，恐招意外之侮辱也。（致罗振玉，1917年7月5、6日）

试问何乡堪着我？欲寻大道况多歧。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欲语此怀谁与共，鼙声四起斗离离。（《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

即使在王国维后期转向古史及考据的研究中，“政治无意识”仍然不时流露。1917年在《殷周制度论》中，他以缜密的考证和论据去论证“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并借此表达了一份殷殷向往之情：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

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摩，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可见，王国维考证的目的是为了从历史的情节中寻找中国文化的情感之根，试图在“可信”中找出“可爱”，所以他从周朝制度中的“立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周姓不毁之制”中发现了一种“定之以天，争乃不尘”的道德精神，尤重其中基于血缘情感而产生的亲亲、尊尊、贤贤与男女有别的观念，这无疑是对政治的一种美学思考。文章写完后的9月13日，在给罗振玉的信中，王国维明确说周制是其“政治上之理想”，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他试图从情感的角度找到了周朝建立政治制度的基础，而这一隐性脉络是充满矛盾的。细读这些文章，我们就能更深地理解王国维的思想在重大历史时期中所隐含的断裂与矛盾。

从1898年对政治的极度关心到丧失信心再到最后对“世变”缄默不语、自沉于湖，这其中强烈的反差的确让人深思。在某种程度上，王国维是属于鲁迅所谓的“心造的幻影”——“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①1927年，王国维走进颐和园冰冷、“干净”的湖水中，以主动选择的死亡——不过是此前精神死亡的肉体消灭而已——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为水中的一个“心造的幻影”。

当然，对观堂先生的志事和学问，知之最深的，还是陈寅恪先生。要中肯地评价王国维及其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位置、要深入地理解这位国学大师在国家民族激变关头所作的努力，没有比陈寅恪先生这一段话更为精练而恰当的了：

①《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6页。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综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坎?一千九百三十四年岁次甲戌六月三日陈寅恪谨序。

两年前,国学网、人民大学国学院等合办的“我心目中的十位国学大师”网民投票评选中,王国维名列第一(68890票,整个评选共收到1242993张选票),成为“国学第一人”。这种荣誉对于观堂先生当然是名副其实的。王国维一生著述60多种,手批手校之书共190多种,其创获之丰,为并世学者所难及。罗振玉在致王氏的信中,就已经确认了时年四十一岁的王国维在近代国学上的最高成就,“国朝三百年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若永能如前此海内之约,则十年后公之成就必逾亭林、戴、段。”又诚如上面引陈寅恪先生